

# 辛亥革命与学界

马洪林

活跃在辛亥革命历史舞台上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军界、学界和会党。身经辛亥风云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记述当时通行的革命组织工作说：“其方法不外藉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sup>①</sup>，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鼓舞”、“歆动”这些力量的“原动力”。这大体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军界、学界和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解放以来，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对军界和会党均有所探讨和论列，论述学界的文章不特寥若晨星，抑且语焉未详。然而，若不对辛亥革命时期学界的表现及其作用进行必要的历史考察，那么，对辛亥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理解。本文拟在这一方面作些粗浅的缕述和分析，借以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引玉之砖。

##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界指的是那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著述中，学界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比较含糊和游移的。似乎既包括济济一堂的莘莘学子，又包括手执教鞭诲人不倦的教师，还包括一切倾心革命的各类有学问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总之，学界包含着学生、教师、学者、编辑、记者等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以学生和教师为主要成分。这个知识分子群，与辛亥革命以前的封建士大夫有本质不同。他们无论在阶级立场上、知识结构上、乃至思想方法上，都已经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兴亡的光荣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经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和座右铭。他们在祖国历史转折的关头，总是挺身而出、联袂而起，立不世之功业，写光辉之篇章。但是，要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和教师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孙中山对此的认识就表现出不断递进的阶段性。

孙中山自早年有志革命后，就积极为革命寻求力量。他教育华侨，联络会党，但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却抱着怀疑的态度，“秀才不能造反”<sup>②</sup>的顾虑在他脑际笼罩着一片疑云。但

<sup>①</sup>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62页。

<sup>②</sup>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5页。

是，电闪雷鸣的学生爱国运动不断在改变着孙中山的固有看法。在一九〇三年四月的拒俄运动中，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们举行集会，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出兵抗俄；上海爱国学社的师生召开拒俄集会，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并通电全国，呼吁各界奋起拒俄；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纷纷发起抗议；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召开了拒俄大会，群情激愤，同声斥责沙皇的侵略，要求清政府进行抵抗，并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又名学生军）。到会的五百名留学生中，会后就有二百余人报名参加，并有十二名女留学生报名随军担任看护工作，推举蓝天蔚为队长，准备去东北抗击俄国侵略者，表现了可贵的反帝爱国热情。青年学生们奏出的爱国、救国、革命的时代音响，深深打动了孙中山的心弦。观察敏锐、激流勇进的孙中山先生，在青年学生身上朦胧地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和力量。所以，后来孙中山曾追忆说：“留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sup>①</sup>一九〇三年夏，孙中山过日本，结交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共同研究布尔人的游击战术，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军事学校，入学者十四人，几乎清一色地是参加过拒俄运动的留学生。临行又曾委托廖仲恺、何香凝等“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sup>②</sup>，可说是孙中山初步认识到知识分子革命作用的具体表现。

一九〇四年冬月，孙中山应邀飘然游至比京布鲁塞尔，与旅欧的中国留学生朱和中等人研讨中国革命进行的方法，相与辩论三日夜，促使孙中山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朱和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党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并断言：“必大多数知识分子均能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sup>③</sup>应该指出，朱和中这种论断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轻视群众的世界观。但却说出了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在革命党人的目光局限于会党和新军的时候，这种议论，无疑是一种真知灼见。孙中山听了深以为然，并决定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凡献身革命的留学生，将分别委以领导任务。尤其着重于发动中国留日学生参加革命。由是“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sup>④</sup>

可见，正因为孙中山在理论和实践上注重发展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故能打开资产阶级革命的新局面。一九〇五年夏，孙中山从欧洲抵日本，看到留学生思想面貌为之丕变，心情十分振奋，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欢欣鼓舞地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sup>⑤</sup>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分留学生的参加革命，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中最觉悟的成份。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山集资产阶级革命派精英成立同盟会于东京之日，也是孙中山高度认识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重要作用之时。同盟会领导成份的主体是留学生自不待言，就是最早一批同盟会员主要也是由这些青年学生所构成。从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间加入同盟会现在可以查出本人成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

② 同上书，第175页。

③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6页。

④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

⑤ 邹鲁：《中国革命同盟会》，《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二），第4页。

份的三百七十九人中，其中留学生和学生三百五十五人，占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官僚、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十人，教师、医生八人，这两类各占百分之二强；资本家、商人六人，占百分之一强；贫农一人。<sup>①</sup>这个典型的数字表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无疑。孙中山眼见留学生中的佼佼者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秋瑾等，才华横溢，灿如群星，挑起了中国革命的重担，胜利的信心倍增，他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sup>②</sup>他“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sup>③</sup>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sup>④</sup>当然，孙中山这里看到的首先是中国人民的觉醒，但也看到了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成因。

为什么革命形势发展如此迅猛呢？这与革命知识分子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们以通俗犀利的笔锋，口若悬河的辩才，把三民主义的真谛，五权宪法的精华，腾播于祖国大地，激起千层革命巨浪。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前的起义经验时指出：“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sup>⑤</sup>，再次肯定了学界宣传对革命的贡献。当历史揭开辛亥革命的序幕的时候，中国人民掀起了民主革命的风潮，为封建专制的清王朝敲起了丧钟，走在时代前列的许多青年学生，是这一时代的号角，他们作为一支叱咤风云的生力军登场，撞自由之钟，揭民主之帜，把资产阶级革命的车轮推上了新的里程。

## (二)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它从各条战线展开，触及社会各个领域。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斗争纠结在一起，汹涌相逐，新陈代谢，汇聚成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急骤变化的历史激流。这场革命大风暴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但要发动一场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必须有正确的革命理论作为先导。在这里，历史的轨迹仍然受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⑥</sup>的制约，资产阶级革命的浓厚理论色彩，显示出与历来的农民运动起于草莽之间的巨大进步。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是为了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农民英雄们对旧制度进行了武器的批判，却没有理论批判的武器，无力最终冲破封建主义的樊笼，不以失败告终，就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却真正要掀翻一个世界，埋葬世代相仍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称过去的农民革命是“英雄革命”，所争者是一姓一朝之天下，而资产阶级革命则是“国民革命”，所争者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前代农民革命迥异。中国的和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表明，资产阶级革命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和深刻的理论造诣，它不可能发自闭塞的被剥夺了受教育文化的下层群众，而是起自受教育有文化的知识阶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义。

①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③④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⑤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国父全集》第3册，第186页。

⑥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

首先，学界是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重要力量。从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五年，一批倾向革命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些通俗的革命小册子风靡了全国。这些壮怀激烈、震聋发聩的精品力作，多数出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的手笔。如写《革命军》的邹容，是一位年方十八岁的青年学子，写《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留学生。其他名噪一时的刊物，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稍后的《云南》杂志、《四川》杂志等，多系由留学生们编辑，向青年学生和青年士兵灌输革命思想的渠道。在这些书刊中，青年学生们用血泪凝成的语句，描绘出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图景，向全国人民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揭露“洋人朝廷”的卖国罪行，发出排满革命的强烈呼声，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造成了推翻清王朝的舆论，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鲁迅先生说过：“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sup>①</sup>

邹容的《革命军》以反对封建专制为主题。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为要旨。他们都宣布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实行民主政治。邹容明确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sup>②</sup>；陈天华以巨大的爱国热忱，呼唤人民大众立即行动起来，“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sup>③</sup>他们服膺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崇奉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憧憬着在中国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前景。对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他们读之如饮狂泉，奉之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sup>④</sup>这些革命书刊曾风行海内，轰动一时，仅邹容《革命军》一书，销售即逾百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编。又如武昌起义前夕的《大江报》，简直成了湖北新军的喉舌，使反动军官们“畏报如虎，恨报刺骨”。颇有点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化为物质力量的气氛。

二十世纪初年，在留学生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致祖国于富强之域，必须认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而青年学生在此中负有桥梁的责任，“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且吾侪学生也，输入文明与有责焉。”<sup>⑤</sup>文化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增进民族智慧的源泉，是促进人民觉醒的催化剂。那种认为可以超越或撇开文化理论学习宣传阶段，而直接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断是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的。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就不能不承认这些青年学生无愧是一群为资产阶级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他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sup>⑥</sup>。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潮象冲决封建堤坝的江流，奔泻于祖国的城市和乡村，而这种思潮的鼓吹者、传播者和首先接受者，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先进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传播于会党和新军的群众之中。

其次，学界涌现出一批革命的生力军。资产阶级革命者并非天生的，而是在学习革命理

①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05页。

②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362页。

③ 陈天华：《猛回头》，《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二），第170页。

④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335页。

⑤ 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第一期，第5页。

⑥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6页。

论和参加革命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姑勿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反抗思想萌发于学生时代，高谈“造反”、“起义”于学校之中。而在革命进程中，也每每在爱国学生中传播火种，以学校为革命活动的阵地。多少忧国忧民、热血沸腾的爱国学子，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而决然充当了革命的先锋，从书声琅琅的校园走向风高浪急的政治旋涡，与爱新觉罗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的疆场，演出了埋葬封建专制政体的历史新场面。

重视教育在国家兴亡中的作用，注意培养学生中的革命力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大特色。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曾尖锐地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不先培养革命人材，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绌。”<sup>①</sup>他常对人说：“余长爱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君到上海时，余与从弟国亲及龚薇生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则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云云”。<sup>②</sup>这清楚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而致力于造就革命人材，从而为辛亥革命事业的发展注入新血液，别开新蹊径。不妨说，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的发动，更不可能取得如此迅速的胜利。

孙中山在回顾革命发动阶段时的情形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sup>③</sup>一九〇〇年以后，他在日本横滨曾与尤烈等“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居东时首先接洽者，文学生有张继、戢翼翬、沈云翔、秦力山、王宠惠、程家桢诸人。武学生有吴禄贞、刘百刚、吴念兹、蔡锷诸人。”<sup>④</sup>

清朝末年，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在学界掀起了一股留学的热潮。到一九〇五年，仅中国留日的学生即达万人以上。在这批负笈东洋的留学生中，不乏千辛万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饱学之士，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身在异乡为异客，孜孜以求地学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师范，以期有朝一日报国有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黄兴入东京弘文学院专攻师范，宋教仁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廖仲恺先后进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专攻经济，秋瑾入日本青山女子实践学校专攻教育，邹容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日文，焦达峰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喻培伦入千叶医学校学习医术，吴玉章入日本成城学校学习文科，蔡锷、李根源、吴禄贞、程潜、李书城等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尤其是在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时期，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盛极一时，“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sup>⑤</sup>并且从这些学陆军的同盟会员中选拔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组成“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⑥</sup>作为团员应有的品德，回国分赴各省参加新军，掌握武装实力。辛亥革命武装首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督军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成员。就是稍后在打掉北洋巨

① 蔡元培口述、黄世晖记：《蔡子民先生传略》，第2页。

②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494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8页。

④ 冯自由：《尤列事略补述一》，《革命逸史》初集第31页。

⑤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8页。

⑥ 《孟子·滕文公下》。

魁袁世凯头上皇冠的战场上，我们仍可追溯到这些军事学校毕业生的功勋。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同样以学校为鼓吹革命之地，培养革命人材之所。先期回国的革命留学生开始多以教师为职业，课堂为讲坛，与国内的革命者相结合，传播革命思想，积聚革命力量。一九〇三年，黄兴回湖南后，在教育家胡子靖办的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兼任历史及体操教员，培养革命青年，同时创立华兴会，准备武装起义。参加华兴会的多数是教师和学生。“当时华兴会在湖南的骨干分布情况如下：宋遯初（教仁）在常德中学；刘霖生（揆一）在醴陵渌江中学；谭石屏（人凤）在新化中学；在长沙的则有章行严（士钊）、柳聘农、张溥泉、曹亚伯以及一班革命教师和学生。”<sup>①</sup>饶有趣味的是，革命者不仅以执教为掩护，以学校为阵地，而且变学校的理化实验室为小小的兵工厂。一九〇四年黄兴与刘揆一、马福益准备长沙起义用的大炸弹，就是请日本人掘井觉太郎指导，在明德学堂理化实验室秘密制造出来的。<sup>②</sup>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学校还有不少，如陶成章、魏兰在云和倡办先志学校，“学校既立，处属各县之人咸徯至，成章为任教事职，兰则奔走于瓯括两郡，处府由是多革命党。”<sup>③</sup>徐锡麟、秋瑾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训练武装青年学生，联络江浙会党，准备在安徽和浙江同时起义。在杭州，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是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的革命发源地”，“在杭州的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主要是武备学生”<sup>④</sup>。在香港，实践女校是当时同盟会在港的主要机关之一，许多著名的革命党人在这里从事教学和革命活动。而澳门培基学堂的演说会几乎成了同盟会的革命论坛。在上海，蔡元培等人成立爱国学社后，“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sup>⑤</sup>在保定，崇实中学和育德中学则成为同盟会河北支部的活动中心。在武昌，发动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主要也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脱下长衫，投笔从戎。例如，同盟会会员文学社《商务报》（后改名《大江报》）总编辑刘复基，曾加入新军当一名副兵；文学社首领蒋翊武，原系上海公学学生，一九〇九年也投入湖北新军，和士兵生活在一起，暗中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在昆明，同盟会会员李烈钧、唐继尧等人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任教官，很快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组织，秘密传阅革命书刊，“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sup>⑥</sup>其时担任云南讲武堂总办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回忆说：“滇省军事教育全权悉握诸吾辈革命党人之手。而讲武堂乃成为云南重九革命之基础。”<sup>⑦</sup>

第三，学界中坚表现了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辛亥革命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出现，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大优点。孙中山十分重视造就军事人材和进行武装斗争。他接受了兴中会时期起义失败的教训，一九〇三年夏秋间，命“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组织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由黄兴教授枪法。<sup>⑧</sup>这些青年学生们，怀着外拒

① 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33页。

② 黄一耿：《黄兴与明德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36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22页。

④ 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24页。

⑤ 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革命逸史》初集，第118页。

⑥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页。

⑦ 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25页。

⑧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第3页。

强敌、内建民国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在与封建统治阶级相搏相射、短兵相接的斗争中，前仆后继，奋斗牺牲，是可歌可泣的。在同盟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中，那些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无不以接受艰巨任务为光荣，以亲临险地为夙愿，一种慷慨蓬勃的朝气，洋溢于革命队伍之间。孙中山在谈到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爆发时的情景说：“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独惜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于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然而会员之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sup>①</sup>同盟会员刘道一、杨卓霖等就是闻讯后自动从日本返国，奔赴起义的前线，而壮烈牺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的。

造成全国革命声势，成为辛亥革命前奏的黄花岗之役，主要战斗力量就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起义前夕，活动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吴、楚、闽、粤、滇、桂、洛、蜀、越、皖、赣十一省之才士乐赴国难，无所图利者，相继来集。临发前一夕，置酒高会，仰天而歌，群有死之之心焉。”<sup>②</sup>战斗打响前，大家争着参加先锋队（敢死队），“其一种为主义而革命之热烈，实不知利害死生为何事也”。例如，朱执信本来在执行别的任务，起义爆发时刚刚赶到，他不顾战友的劝阻，立即裁去长衫的下半截，参加了进攻督署的战斗，虽然“胸膈受伤，血透衣外”，仍奋勇争先，表现了一往无前的气概。起义失败后，丛葬在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中，喻培伦（云纪）、林时爽、方声洞、林觉民、徐广滔等也多系青年学生。

资产阶级革命者表现的这种爱国热情和革命英雄气概，他们视富贵若浮云，置生死于度外的高尚情操，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阶级风貌。陆皓东参加乙未广州起义，第一个为共和捐躯；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牺牲了仅仅二十一岁的宝贵生命；禹之谟受尽酷刑，纵然粉身碎骨也绝不低下高贵的头颅；熊成基在敌人屠刀下，仍昂然宣告“愿以一腔热血，灌自由之花”；徐锡麟在安庆发难，被清军挖心炒肝顷刻食尽；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而抱恨终天；林觉民题绝命诗喋血广州城头；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含笑走向刑场。他们死节之烈，浩气英风，诚足为后死者之模范，中国人民之骄傲。“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些青年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终于在炮火中迎来了辛亥革命胜利的黎明。

### （三）

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给学界以民主的洗礼。他们感觉敏锐，首当其冲，充分运用了他们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有利条件，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把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到处传播，促进了人民的觉醒，起了革命的桥梁作用；在革命斗争中，他们崇仰民主，醉心共和，参加组织革命政党，批驳保皇派的谬论，投入武装斗争，冲锋陷阵，再接再厉，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而奋斗不息，做了革命的先锋；他们有知识、有觉悟、有能力，年轻有为，朝气蓬勃，是构成革命政治指导力量的重要方面军，不少人以辛亥元勋、共和名将而彪炳史册。他们那种艰苦卓绝的斗争勇气，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献身精神，不仅光耀于当时，而且启迪于后世，时至今日，仍不减其伟大的光辉，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值得珍视的精神

<sup>①</sup>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7页。

<sup>②</sup> 章士钊：《赵伯先事略》，《碑传集补》卷五十七。

遗产。列宁教导我们说：“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我们肯定在辛亥革命中起重大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并不否定主张君主立宪的那一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但是，学界中人毕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这些刚刚走出书斋的青年学生，满怀爱国救民的衷肠，匆匆走上民主革命的战场，并未来得及铸造自己的民主利剑，只能借用西方资产阶级武库中早已陈旧的武器，缺乏战胜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虽然在革命斗争中，他们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几件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的武器磨砺得雪亮，在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中放出一派异彩。但是，没有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失却灵魂，败下阵来，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亲热的思想文化同盟所击败。

理论的贫乏，阶级的烙印，时代的局限，都是使这些青年学生挫失的因素。他们的革命宣传虽然曾经一度所向披靡，读之令人神旺，实质上还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加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仍然不能引导革命的航船驶向胜利的港湾。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起义失败后的消极颓丧情绪，暗杀之风韵漫延滋长等等，都表现了这一时期学界的特点和弱点。尤其令人悲悯的是一些学界人士竟以自杀作为一种抗争的形式。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之一陈天华，不甘受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的侮辱，留下一篇《绝命辞》后，在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为了使回国的留日学生不致失学，姚宏业、孙镜清等在上海吴淞办了一个中国公学，收容回国的留学生就学，后因学校经费竭绝，姚宏业竟投黄浦江而死。吴玉章沉痛地说：“从陈天华的蹈海到姚宏业的投江，一时自杀成为风气，这固然表现了他们富有爱国热忱，轻于牺牲自己；但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由于没有更高的革命理论和更好的革命方法，只得以自己的生命来激励人民。其志可嘉，其行可悯，但不可为训。”<sup>②</sup>这一精辟的分析，既指明了学界人士轻生的原因，又揭示了理论贫乏的可悲，今天读来仍然给人们以极大的启示。

当然，辛亥革命对学界也是个大熔炉，它使真正的革命者百炼成钢，它无情地淘汰那些坏料和废渣。学界也不乏经不起血和火的考验，受不住高官厚禄诱惑的人物，他们有的动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有的叛变。吴玉章回顾说：“就是那些真心爱国的人，也多半只有‘五分钟的热忱’，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热时冷、易于动摇妥协的毛病。这种情况，不独四川留学生如此，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乃至一切知识分子也都一样。现在屈指数来，当时闹得轰轰烈烈的人，真正坚持革命到底的却没有几个。”<sup>③</sup>

辛亥革命时期学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缺乏牢固的群众观点。他们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出发，认为自己是“原动力”，是“先知先觉者”，轻视群众的力量，不愿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因此，一些人容易走上冒险、暗杀以致自杀的歧路。

当然，我们无权苛求辛亥革命时期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的学界人士正确处理和群众的关系，但是有义务接受历史宣示的真理：“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sup>④</sup>我们讴歌历史上的革命者，礼赞历史上的惊人事业，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历史画卷；我们如实地分析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中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激励生生不息的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时期学界先烈们的血并不是白流的。他们成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光荣先驱。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28页。

②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78页。

③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69页。

④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6页。